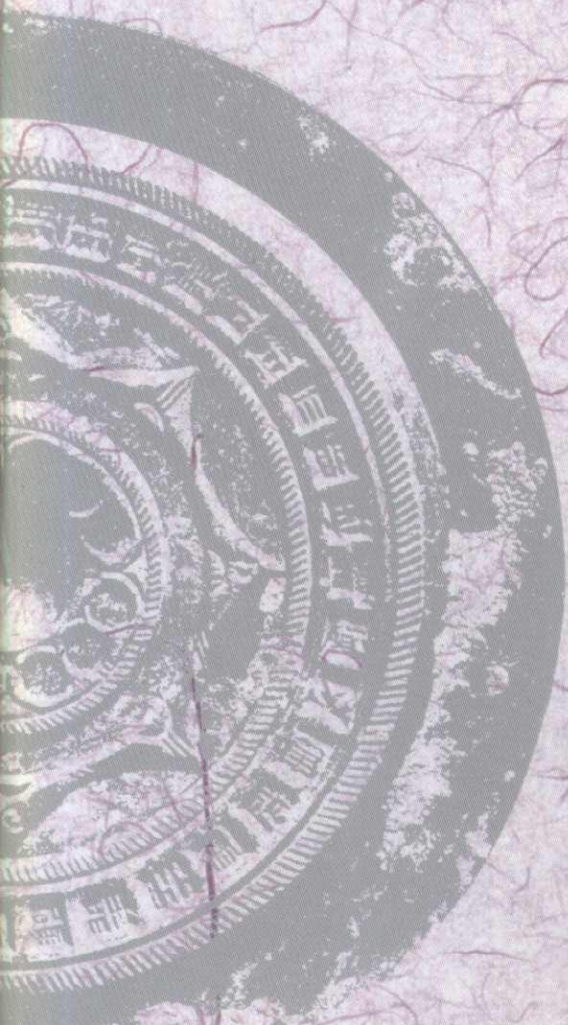


汉字传播史

陆锡兴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313

H1-09
L89

HANZI CHUANBO SHI

汉字传播史

陆锡兴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HANZI CHUANBO SHI

汉字传播史

陆锡兴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890 毫米×1 240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40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7 - 80126 - 870 - 9/H · 210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亚洲是世界文字演化的大舞台，西亚是西方标音文字的发源地，东亚是东方标意文字的故乡，两种文字交汇、融合，产生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字。西方的标音文字起源于西亚的苏美尔文字，由此产生的腓尼基人的楔形文字，向东传入希腊，形成希腊文字，西传形成了拉丁字母，它顺利地传遍了西欧和中欧，东传形成了斯拉夫字母；波斯人借用腓尼基文字造就了古波斯文字，而改变腓尼基文字而来的阿拉米文字在东方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在西亚形成古希伯来文字、叙利亚文字、巴列维文字、阿拉伯文字、安息文字。安息文字变为萨珊文字，在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中亚的粟特人创造了粟特文字，花拉子模人创造了花拉子模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婆罗米字母是改造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而来，婆罗米字母有多种变体，悉昙体、笈多体和天城体。婆罗米文字演变出南亚的巴利文字和卡丹巴文字。在印度北部，在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吸收了婆罗米文字的成分形成了佉卢文。西方标音文字分三路传入古代中国，形成各个民族标音文字。中路佉卢文东传，形成了古于阗文、鄯善文；婆罗米文字东播，形成了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焉耆——龟兹文传给回鹘，形成婆罗米回鹘文，以后阿拉伯文字东传，又形成新回鹘文。北路主要是粟特文字传入，突厥文字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回鹘文实际上是用粟特文字拼写回鹘语，加以必要的改进。回鹘蒙古文字借自回鹘文字，女真人参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南路梵文从陆路传入西藏，形成了藏文，元代蒙古人一度采用藏文字母创制了八思巴蒙古字。另一路传入傣族地区，傣文是在婆罗米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汉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种标意文字，它在商代就开始从中原向外传播，向四方发展。它的传播途径大致上可分为向西南、向

南、向北、向东北、向东这五条线路。向西南有古代巴蜀、彝族、南诏和大理；向南有楚、吴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壮族、苗族、瑶族、侗族、僮僮族、水族以及越南；向北有白狄、匈奴、西夏；向东北有高句丽、渤海国、契丹、女真；向东有朝鲜、日本、琉球。周边民族对汉字的利用一般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说汉语，用汉字，有点像现代使用外语一样，汉字与本族语言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二阶段，用汉字的假借字或者自造方字来标志本族的部分语言，它常常和汉语混合在一起。第三阶段，创制民族文字，全面地标志本族语言。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每个民族必须经历的，而是根据与中原的密切程度，有所区别。可以这样说，走到第三阶段的民族必定建立独立政权，但是，建立政权的民族未必都会走到第三阶段。日本、朝鲜和越南属于前者，而中国的地方民族政权情况比较复杂。大唐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周边的民族不管建政与否，都使用和中原统一的汉字，没有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无论是不时与唐对立的南诏，还是隶属于唐的高句丽。宋代积弱，契丹、西夏、女真与宋对峙，先后创制了民族文字。南方几个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与汉族和睦相处，生活在同一个政治背景下，没有必要创制完全的民族文字。另外创制民族文字和民族的语言有关，在语言谱系上与汉语比较远的民族，尽管吸收了大量汉语词，但是本族语言中的固有词汇、语音结构不同，语法的差异很大，所以不便使用现成的汉字，更适宜另创新的文字。非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都采用与标意汉字不同的标音文字，如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契丹的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日本假名取法梵文、契丹小字取法粟特回鹘文、谚文取法汉字反切，都是汉式字形外壳，标音文字的制度。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壮族、苗族、瑶族、侗族、僮僮族、白族均在汉藏语系之内，对本族语言来讲，可以利用汉字的方字就可以解决语言上的差异。西夏和彝族是在汉字传入后另创民族文字的，不过两者都没有走标音文字的道路，而是采用与汉字一致的标意文字体制，特别是西夏文字，虽然部件与汉字不相像，但是制度上有许多共同点，由独体和合体两个部分组成，合体字的主要构成方式也是会意、形声。越南语的谱系分类现在虽然倾

向属于南亚语系,可是又具有汉藏语系的某些特点,所以它只是在汉字框架内,采取以方字形式的民族文字。

汉字传播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传播,首先,有使用汉字历史的民族,即使自创了民族文字,也不切断与汉字的关系,契丹、西夏都实行汉字、民族文字的双字体制,女真一度实行包括契丹字在内的多字体制。朝鲜、越南在推行民族文字之后,汉字依然是当地的正式文字,社会上层还在使用,许多重要的文件也使用汉字。日本用汉籍和读等办法,让使用日文的人通晓汉字文献。汉字是标意文字,它的文字构造不仅只是读音,还自然而然地带有一些意义,在接受汉字的同时,也接受相关的观念。同时,汉字与汉文化相表里,汉字的传播无不以中原文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先行进入,然后才是汉语汉字,导致民族文字的产生。这样汉字扎根在文化的沃土之上,根基特别牢固,时时刻刻会突显出来。所以,有汉字使用史的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感远远超过西方民族。

可以看到,汉字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如果不把它放在这个大背景里来考察,肯定是行不通的。

汉字传播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第一,要整理出传播的路线和时间,即传播的地理走向和传播的历史时间。第二,要弄清传播的状态,该民族如何使用汉字和使用的范围。第三,民族文字的创制,弄清民族文字的蓝本是什么,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或者多元的。这些问题虽然在以前有所涉及,但是都不明确,没有做过仔细的踏实的研究。本书希望能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对未知的探索有一个过程,这既取决于笔者的能力,更取决于客观条件。

我对汉字传播史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有两个领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在考古方面,各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文字方面,不仅在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文字资料无论在西方标音文字东播,或者汉字在东亚的传播,都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的研究铺设了道路。在民族

古文字方面,它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三大块获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在宏观的体系和微观的语词考释方面都有可观的探索。同时在南方的少数民族的古文字研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持续不断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这两方面的成果是我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使本书具有较高的起点,把力量集中于传播本体上,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文字学到了今天,已经形成了很多分支。汉字传播史应该属于汉字史的内容,但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不仅有中国民族古文字,也有一些东亚民族的文字史,所以它也是世界文字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因为它代表了东方标意文字的历史。按照文字学的分类,汉字传播史只能是汉字向其他民族传播的历史,不包括本民族之内的各种民俗文字现象。这样一向视为民族古文字的女书,我认为只是由通行汉字演变而来的女性隐秘字,当然不在本书范围之内。我在已经完成的《汉字的隐秘世界》这部民俗汉字学著作中,专门为女书安排了一个章节。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	(1)
一、汉字的形成	(2)
(一) 有关中原文字萌芽的探索	(2)
(二) 多源的中原文字	(7)
二、汉字的统一	(11)
(一) 夏商已有成熟的文字	(11)
(二) 文字纷乱的战国	(18)
(三) 秦统一文字	(21)
三、历史上重要的正字活动	(24)
(一) 俗字的产生	(24)
(二) 正字与俗字的关系	(33)
(三) 汉代的正字活动	(34)
(四) 俗字泛滥的六朝	(39)
(五) 唐代楷体正字的确立	(41)
四、方字问题	(46)
第二章 西方标音文字东传的影响	(52)
一、西方标音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53)
(一) 西方标音文字的产生	(53)
(二) 西方标音文字的传播	(54)
二、标音文字东传而形成的民族文字	(59)
(一) 中路传播而形成的民族文字	(59)
(二) 北路传播而形成的民族文字	(65)
(三) 南路传播而形成的民族文字	(75)
三、标音文字在汉地的传播及影响	(78)

(一) 西方标音文字在汉地的流传	(78)
(二) 西方标音文字对汉字的影响	(86)
(三) 汉字标音化的尝试	(93)
第三章 向西南传播史	(99)
一、中原文字在巴蜀的传播	(100)
(一) 夏商、西周文化对巴蜀的影响	(100)
(二) 巴蜀的图形符号	(102)
(三) 巴蜀方块文字	(108)
(四) 巴蜀文字的统一	(113)
二、受汉字影响的彝族文字	(117)
(一) 彝族先民与巴蜀、汉文化的接触	(117)
(二) 彝文的来源	(120)
(三) 彝文的体制	(123)
三、南昭、大理使用汉字	(132)
(一) 汉晋时期汉字在云南的传播	(132)
(二) 南昭与南昭文字	(138)
(三) 大理国与大理汉字	(141)
(四) 白文的起源	(144)
(五) 白族的白文	(150)
(六) 汉字白文的体制	(159)
第四章 向南传播史	(166)
一、汉字在吴楚的传播	(167)
(一) 楚地文化与文字	(167)
(二) 吴越文化与文字	(172)
二、汉字在闽越的传播	(179)
(一) 闽越与中原的关系	(179)
(二) 汉字传入闽越	(181)
三、汉字在岭南的传播	(184)
(一) 南越国使用汉字	(184)
(二) 中原文字传入西瓯	(187)

(三) 中原文字传入骆越	(189)
四、壮族使用汉字	(190)
(一) 壮族使用汉字的历史	(190)
(二) 汉字壮文	(192)
(三) 汉字壮文的作用和不足	(198)
五、苗族使用汉字	(201)
(一) 苗族和苗族使用的文字	(201)
(二) 清代以来的各种苗文	(203)
(三) 汉字苗文	(206)
六、其他少数民族使用汉字	(209)
(一) 瑶族的汉字瑶文	(209)
(二) 侗族的汉字侗文	(213)
(三) 布依族的汉字布依文	(216)
(四) 僮僮族音节文字中的汉字	(217)
(五) 水族的水书	(218)
七、越南使用汉字	(223)
(一) 越南使用汉字的历史	(223)
(二) 喃字的形成	(225)
(三) 汉字在越南的命运	(233)
第五章 向北传播史	(236)
一、周文字传入白狄	(237)
二、匈奴和匈奴的文字	(238)
(一) 匈奴本无文字	(238)
(二) 中原文字传入匈奴	(240)
三、汉字在西夏的传播	(244)
(一) 汉文化影响下的西夏	(244)
(二) 西夏文的创制	(248)
(三) 笔画繁复的西夏文	(251)
(四) 富有特色的标意文字	(252)
(五) 西夏文的字体	(259)

(六) 西夏文始末	(261)
(七) 蕃字汉字的双字制	(266)
(八) 西夏文的语言文字书	(270)
第六章 向东北传播史	(274)
一、高句丽使用汉字	(275)
二、渤海国使用汉字	(281)
(一) 海东盛国渤海	(281)
(二) 渤海国的汉字	(283)
三、汉字在契丹的传播	(288)
(一) 汉文化影响下的契丹	(288)
(二) 契丹字的发现与研究	(289)
(三) 汉字与契丹字的双字制	(292)
(四) 契丹文的创制和使用	(299)
(五) 契丹大字	(305)
(六) 契丹小字	(312)
四、汉字在女真的传播	(322)
(一) 汉文化影响下的女真	(322)
(二) 多字制的金代	(325)
(三) 汉字在金廷的使用	(327)
(四) 女真字的创制和使用	(331)
(五) 女真文的发现与研究	(335)
(六) 女真文的构造	(339)
(七) 女真文的意字和音字	(341)
(八) 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	(343)
第七章 向东传播史	(348)
一、汉字在朝鲜的传播	(349)
(一) 汉字传入朝鲜	(349)
(二) 吏读的产生	(352)
(三) 汉字向谚文的过渡	(358)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369)

(一) 汉字传入日本	(369)
(二) 汉字的日本化	(375)
(三) 日本标音字母的产生	(379)
(四) 假名字母产生之后的汉字	(389)
三、汉字传入琉球	(393)
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	(396)
后记	(432)

第一章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汉字的形成

(一) 有关中原文字萌芽的探索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前的文化遗址遍及全国各地。考古研究证明，史前的不同文化曾长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在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核心——黄河流域中部的中原文化区。汉字，作为华夏族的文字，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

汉字究竟什么时代产生的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汉字的形成是史前发生的，它没有文献记载，全有赖于考古发掘。先民的典册容易朽败，不大可能保存到今天，这就意味着面貌清晰的文字几乎不能发现。事实上，我们能见到的只是陶器上一鳞半爪的符号。虽然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有一定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但发掘的范围再广，也总有空白（当然也总有一些未发现的重要文化遗址）。可以认为，通过考古资料来认识汉字的形成仍带有一定局限性。就目前情况来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尽可能达到接近事实的结论。

继磨制石器之后，陶器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陶器甚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城子崖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器上刻划的标记；但人们把它作为原始文字来研究，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半坡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发现之后。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常有一些与花纹不同的刻划符号，是在陶器烧制前后刻在口沿上的（黑陶上也有这种刻划，但数量较少）。据统计共有刻符113个，27种类型。到20世纪70年代，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又发现了这类刻划符号，数量与种类比半坡遗址要多，计129个，38种。此外，在关中地区的临潼零口、垣头和长安五楼、命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遗

址也有类似的刻符发现^①。

仰韶文化的刻符一般笔画简单,大多数是直线与交叉线,但与古文字中某些笔画简单的字形相似。所以,这类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郭沫若认为,古代器物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因此,“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由后以例前,也就如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②”。郭沫若的观点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从陶器上的图形纹饰推测,当时还应该有象形文字”。“从仰韶文化算起,我国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③”。

但是,仅仅依靠刻划符号与后世文字作形似比较来说明其具有文字性质,恐怕是靠不住的。例如刻符中“|”“+”“×”“𠄎”在许多民族符号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形象,而简单的线条组合的相似性有其必然性。所以说,即使刻符与甲骨文有相同的形体,也不能作为原始文字的依据。而且,制作器皿,特别是陶器,作一些区别性的记号,在文字产生之后也有此类情况。对此,裘锡圭认为,汉字受到这类符号的影响,吸收了一些记号,“并不等于承认这些记号本来就是文字^④”。汪宁生也持这种观点,认为这类随意刻划的符号,“当时人们并未赋于一定的含意,今天自无从解释^⑤”。

生活在云南、四川的普米族社会发展不平衡,部分族群不久前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余,他们至今还使用刻划符号表示占有、方位和数量。这种示意性质的符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没有读音,所

①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文物》1975年第8期。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②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6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④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⑤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以也不是文字。“从历史来源看,刻划符号在木刻、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来又演变为图画文字^①。”普米族的刻划符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基本上可以说明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性质。不过,从仰韶文化的刻符来说,它只是陶器符号,不像普米族那样记在木房上的记号,可以推想当时的记事符号要复杂一点。事实上,姜寨发现的刻划符号就比半坡遗址的复杂,特别是“𠄎”和“王”,极有可能本身已经是文字了,人们很难说这是随意而作。总之,半坡姜寨遗址仰韶文化刻符虽不是文字,却是文字诞生的前夜,从形体看,已经表现出某些原始文字的雏形。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西安半坡遗址向南不远的长安县斗门乡花园村客省庄 2 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有文字符号的兽骨。经过初步研究,在兽肋骨上有一个“萬”字,在骨筭上有一个“退”字,字形清晰,刀法拙朴。斗门乡花园村在古代西镐河故道南岸台地上,是先民的一个聚居地,距今已达 4500 年^②,这个时期相当于史传黄帝时代。

我们把眼光转向东方,看看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在十年动乱期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了 4 件陶尊,在外壁靠口沿的相同之处各刻一个符号,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73 年,诸城县前寨发现一块大残陶片,上面有一个残缺的符号,这个符号与莒县陵阳河的一个符号相同。1979 年诸城县陵阳河、大朱村考古发掘又发现了陶尊符号,这样前后共有 17 个符号^③。陶尊形体特大,而随葬之墓也与一般墓葬不同,很引人注目。大汶口的陶器符号和有关的商代文字十分相似,显示出两者的密切关系。因此,古文字学界反映相当热

① 严汝娴:《普米族的刻划符号》,《考古》1982 年第 3 期。

② 参阅《陕西日报》1986 年 5 月 3 日、《光明日报》1987 年 3 月 19 日、《文汇报》1989 年 3 月 26 日有关报道;郑洪春:《试论龙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文博》1990 年第 4 期。郑洪春先生惠赠照片,在此鸣谢。

③ 大汶口陶尊符号的发现情况可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 年;任日新:《山东诸城县前寨遗址调查》,《文物》1974 年第 1 期;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年。

烈。于省吾首先释了字,依据商周甲金文,此字为太阳、云气、山的形象,是原始的“旦”字,隶定作“𡗗”。并认为“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可以说,当时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①”。唐兰在陶器刻符之外又提出了大汶口遗址 75 号墓内灰陶壶上用红色颜料写的一个符号,并把这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作了详细比较,释作“𠂔”“𠂕”“𠂖”“𠂗”。对于陶符,唐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看到的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根据这种陶器文字已经是比较进步的文字这一点,我们相信这个文化里一定已经有很多文字,在当时社会里已经有足够使用的文字^②。”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陶符是一种进步的文字,成熟的文字。彭邦炯、陈国强不同意唐兰的意见,认为陶符“还是一种处在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就目前发现的这几个原始文字看,再成熟也难以用来记载当时人们的活动,表达思想和语言^③”。“还属文字的起源和萌芽,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图画文字’,还不是真正的文字,不能说是‘文字的发明’^④”。裘锡圭一方面指出:“一个图形文字只要经常被用来表示族名,就会成为代表一定的词的符号,也就是说,就会具有作为一个文字的基本条件。”一方面又指出:“我们把大汶口文化用作族名的象形符号称为原始文字,而不直接称为文字,是由于在当时还不可能存在完整的文字体系。”“看来这种文字已经不是最初期的原始文字了^⑤。”持彻底否定态度的是汪宁生,他认为出土材料不足以证明大汶口陶符作为表音的语言符号,“在此

①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 年第 2 期。

② 参阅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再谈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均收入《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8 年。

③ 彭邦炯:《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制社会》,《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④ 陈国强:《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

⑤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